

新四军南走茂林的北移路线 究竟是谁决定的

李百齐

1941 年 1 月 6 日,新四军皖南部队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被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包围全歼,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造成这一惨案的直接原因在于选择了错误的北移路线,误进了茂林“绝地”,在高山险关之下,被优势的顽军包围,无法突出,造成了我军历史上一次罕见的惨败。因此,谁决定了新四军南走茂林的北移路线,即承担这次失败的历史责任,是党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对于这个问题,党史学界目前大致有四种看法。一种意见以发表在《安徽史学》上陈辽同志的文章^[1]和发表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上刘喜发同志的文章^[2]为代表,认为这条路线是叶挺军长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商定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的。第二种意见认为新四军南走茂林是新四军军分会集体讨论中对几条路线比较选择的结果,是军分会的集体决定。第三种意见根据现存所谓中央军委 1940 年 12 月 23 日给项英的“皖南部队全部绕道茂林,待机北渡”的电报抄件,认定这条路线是中共中央指定的。第四种意见以刘庭华、黎汝清等同志为代表,认为茂林之路是项英提出,并在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上强行予以通过的,这条路线事先未向中央军委请示、事后事实上也未向中央汇报,完全是项英独断专行决定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此没有任何责任。下面就这四种答案让我们作一点分析论证。

首先,所谓南进茂林之路是叶挺与三战区商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的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上述陈辽同志在他的文章中就此论点提

出了九条论据和六条旁证。然而仔细分析我们发现,这些论据和旁证是不能成立的,把“移苏南”与“走茂林”划了等号,因而得出了与实际不符的结论。新四军军长叶挺确曾赴上饶与国民党三战区长官顾祝同商定过新四军经苏南由镇江附近渡江的北移路线,经宣城、郎溪东进,走三战区与敌占区之结合部。路线确定后,大约在 12 月初,新四军军部的一千多非战斗人员和两千担资财即循此路去了苏南。但同年 12 月 10 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强令新四军改道北移。电报说:“(一)查苏北匪帮(指陈毅、粟裕所部—作者注)不断进攻韩部(苏北韩德勤所部顽军—作者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3]很明显,这里的“改道”系指由苏南渡江进入苏北改由新四军军部驻地泾县直接向北在铜陵、繁昌一带渡江进入皖中。接到三战区转达的上述蒋介石的命令,叶挺、项英于 12 月 21 日将此情况上报中共中央。^[4]稍后,项英又致电中央:“……近顾忽令我军改道……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速指示”。^[5]接到新四军方面的报告后,中央立即于 12 月 25 日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要求他们“速向蒋交涉下列各点,并速告结果:(1)须分苏南,繁、铜两路北移。……(4)皖北军队由巢、无、和、含四县撤退,由张云逸派队接防,掩护渡江。”^[6]不难看出,这都是围绕东进还是北进的争执,与

南走茂林的路线没有关系。陈辽引用的原国民党三战区参谋处长岳星明的回忆，^[7]也很难作为佐证。此外，1940年年底，蒋介石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剿灭皖南新四军的战略部署已经完成，他不可能从第三战区防区内为新四军另划一条比原定的东进之路更远离日军、因而更安全可靠的北移路线。蒋介石12月10日电令皖南我部改道铜、繁北渡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新四军在滚滚长江之中去碰日军的刀锋，行借刀杀人之计。再则，国民党当局对新四军寻找机会回到闽、浙、赣打游击始终存有戒心，因而决不会让皖南新四军向南开进，合法地进入其后院的。所以说叶挺军长与三战区商定了南走茂林的北移路线是根本不可能的，此说不能成立。此事在事变发生之前，新四军与中共中央的往来电报中从未提及，何来中央批准之说？至于中共中央1941年1月3日致项英的电报中说的：“你们全部坚持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8]则更不难理解，中央在此肯定的是“开苏南”，而东进苏南，传统路线就是从泾县东进。远在陕北的毛泽东，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项英会带着全军人马南进茂林去“自寻绝路”的，这里的“完全正确”绝不会是肯定“南走茂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在驳斥国民党说新四军“叛变”的谎言时，确曾说过“这次新四军江南部队北移，原由三战区长官顾祝同与叶挺军长当面规定经由苏南渡江”^[9]的话，但这里中央强调的是三战区曾同意新四军“由苏南渡江”，而只字不提“经茂林”一事，这既是论战策略，也反映了新四军擅自南进给中央造成的政治被动。相反，在我们的内部总结中，则明确指出这条路线“非常错误”，是项英“自寻绝路”。这都说明党中央事先根本不知道项英要带着人马向南开进，从而也就谈不到批准了。1941年5月，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召开皖南事变总结会，陈毅、饶漱石都对谁批准南走茂林、为什么要走茂林提出疑问，但

没有人能回答。^[10]如果经茂林东进之路是中共中央批准的，这些高级领导人不会不知道，皖南事变中脱险的领导人也不会不知道。这也说明，“中央批准”之说无法成立。

第二，关于中央军委1940年12月23日命令新四军皖南部队“绕道茂林、待机北渡”的电报抄件，黎汝清同志在《皖南事变》代后记中曾作过详细分析，指出这个抄件肯定是假的，因为“一个不合理的假证据是不可能推翻十个既合理又确凿的真证据的。”^[11]笔者认为，黎汝清同志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相信读过这个“代后记”的同志对此也会信服的。即中央军委决不可能违背常规去给新四军指定一条具体的行军路线。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同志生前也明确指出“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北移具体路线，中央从未遥作决定，所谓中央曾定下新四军应走哪条路线，皆系揣测之词。”^[12]陈文坚持说不能轻易否定这个抄件，认为刊登这个电报的报纸不可能有意捏造。^[13]其实这不难理解，假设这个所谓抄件果真来自“某报纸”，它极有可能是国民党的报纸。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为了把新四军“擅自（向南）行动”的责任推给中共中央而在某报纸上造谣，应是可能的。

综上所述，新四军南走茂林的北移路线系“中共中央指定”或“与三战区商定并经中央批准”之说都不能成立，新四军南进茂林无论从党纪还是军纪来衡量，都是一次地地道道的“擅自行动”。

现在已经知道，新四军皖南部队南走茂林的北移路线，是1940年12月28日在由项英主持的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上决定的。项英是在中共中央26日来电严责下，被迫召集军分会会议讨论北移路线问题的。这次会议的具体讨论过程现在已难完全搞清，但南走茂林是在项英的坚持下强行通过的，当是没有疑问的。

1941年1月11日，叶挺在突围绝望之时

给中央的电报也可给我们提供一些理解这一问题的线索。到1月11日，皖南我军数次突围失败，全军已陷绝境。在这种情况下，叶挺抱着必死的决心，满怀悲愤给中央发电，他首先向中央表示愿意承担全部失败责任，“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实因处事失计、指挥失当所致”，接着笔锋一转，向中央郑重声明：“但政委制之缺点实亦一因”。^[14]明确地指出了项英对失败应负的责任。作为在危急关头对中央的陈言，叶挺是在用简洁而又带隐晦的语言，向中央交代这次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谁都明白，叶挺根本没有可能对这次失败承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所谓“挺应负全责”只是自我批评精神的体现。那么谁“应负全责”呢？是“政委”项英。因为此时的叶挺当然清楚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北移路线错误，那么谁决策南进，谁才能负失败全责。这里，叶挺话虽说得委婉，潜台词却是“项英路线抉择失误，导致全军陷此绝境”。

据上分析，我们可认为新四军南走茂林的北移路线根本不能算作军分会的集体决策，自然也不是什么军分会对几条路线比较选择的结果。因为如果在军分会会议上，与会者如能展开平等的、认真的、不带任何主观偏见的讨论，就不可能形成南进的决议。关于这一点本文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曾作过分析论证，^[15]限于本文主旨，在此不作重述，仅举几个要点说明如下：（1）南走茂林比东进宣城敌情要严重得多，向南是向顽军布置的口袋里钻，向东是跳出包围圈的问题；（2）南进在地形上比向东要险恶得多，即所谓茂林是块“绝地”；（3）南进在政治上对我极端不利，国民党说我们是要去其后方造反，我们有口难辩。这些情况，与会者都是清楚的。此外，退一步讲，假使与会者特别是项英确实认为南走茂林是比北走铜、繁，东去宣城更为安全的选择，就完全应该而且可能立即向中央如实汇报军分会决议情况，以求

得中央指示，但项英却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对南进一事讳莫如深，一字也不透露，甚至连暗示都没有，这难道不说明问题的不正常吗？其二，当新四军在茂林被围后，中央去电质问项英为何率军进入了茂林，项英不敢如实汇报，仍未申明是军分会决议，再一次欺骗中央说：“南走茂林是先对南面之敌佯示威胁，吸引顽方注意然后突然东进转向苏南”。^[16]这都说明，南走茂林不是军分会正常决议，而是项英独断专行、在会议上强行作出的违背其他成员和叶挺意志的“决议”，事后也没有向中央汇报。所以完全是项英造成了皖南失败的历史悲剧。至于项英为什么执意要南走茂林，这已不是本文讨论的范畴，在此不再赘述。

注：

[1]《皖南事变历史和〈皖南事变〉小说》，载《安徽史学》1988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88年第6期收入。

[2]《对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的一点看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3]《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13页。

[4]《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第7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5]《皖南事件（资料选辑）》第118页，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6][8][9][14][16]《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第119、127、154、134、271页。

[7]岳星明回忆录见《皖南事变资料选》第31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10]《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2期第24页。

[11]小说《皖南事变》第787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12]《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5页。

[13]《安徽史学》1988年第2期第3页。

[15]《新四军为什么要选择南走茂林的北移路线》，《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责任编辑：焦春荣）